

区域佛教史研究的鼎力之作

——评杜斗城先生的《河西佛教史》

崔 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杜斗城先生的《河西佛教史》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通篇78万字，方立天先生为之作序，可称得上是一部鸿著。从工作之始，先生就致力于河西佛教的研究，虽然先后出版了《陇右高僧录》、《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研究〉》、《北凉译经论》、《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以及《正史佛教资料类编》等一批有影响的著作，但不曾放弃对它的关注和思考，期间虽历经工作繁忙和诸多变故，一直恒心未改。可以说，这部书是先生半生心血研究成果的结晶。

河西佛教史在我国佛教发展传播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课题难度大，内容涉及面广。早期中国内地佛教的传入主要是通过河西走廊输送的。两晋至北凉时期的河西，佛法兴隆，是当时重要的佛教中心之一，对内地佛教的发展影响深远。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发展受中原王朝的影响很大，佛事兴旺的同时留下了数量规模令其他地方无以比拟的石窟艺术文化。中唐以后形势逆转，吐蕃统治者对河西地区的占领，使河西佛教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接受藏传佛教。从脱离中原王朝统治到西夏王朝，该地区的史料十分少见，佛教研究无从谈起。但上个世纪之初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五万余卷文书呈现给世人。大量的佛经文献和社会文书成为研究当时佛教的第一手资料。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至西夏和蒙元开始一直到明清，藏传佛教深入河西地区，成为与汉地佛教冲突的地带，一直延续到今天不变。以上这些事实都说明河西佛教历史悠长但又错综复杂，在我国区域佛教史中的地位十分独特，成为撰写难度大、成分复杂的一个地区。要想对它的全貌作完整的勾勒，确实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正是凭着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对学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先生十几年终磨一剑。

整个写作体例按历史朝代顺序编排，从两晋

到明清。内容从译经、奉佛、人物到石窟艺术及民众信佛的情况，从整体上给了古代河西佛教一个复原。从研究区域史的角度看，可称得上是一部特色明显、涉及全面、创新颇多、学术价值较高的研究成果。该书严格遵守学术规范，追求学术的严谨性。比如佛教在两汉交际开始传入我国，河西作为必经之地也有其历史，但由于历史资料的空缺，作者并未强作解人，而是从西晋写起，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风格。通读该书之后，认为其特色和启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作者将佛教看做一种文化并与地理区域有机结合起来。二十世纪以来，宗教历史文化研究有关中国佛教史的论著层出不穷，然而区域性的佛教史论著寥若星辰，并且多数受到行政省区划分的束缚。作者能打破这种限制，从文化区域性的角度来审视佛教发展，给人一种完整的地域文化发展概貌。“河西”自古名声悠远，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河西文化。这种文化虽然没有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在当今影响那么大，但毕竟有着区域性的文化特色。作者的这种思想在内容简介中已经明确透露：古代“河西”泛指黄河以西之地，与“河东”（约今山西）相对而言，其地理范围大致为今陕北、宁夏、甘肃大部分地区。汉武帝设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五郡，史称“河西五郡”，其地理范围不出今甘肃中西部地区。今人又称甘肃境内的乌鞘岭以西地区为“河西走廊”，地理范围更小。《河西佛教史》所涉及的范围不仅限于“河西走廊”，有些章节的内容涵盖了今甘肃的大部分地区，甚至涉及今宁夏、青海以及新疆东部地区。其实这一地理范围，正是今天河西文化所覆盖的区域。这一从文化领域角度审视佛教历史发展方法，对我们以后研究区域史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二、文章在内容编写上做到了两个“突出”。一是突出了以佛教发展历史为线索的特点，突破

了传统修史者专注于佛教思想而史实考证不精，或精于朝廷奉佛而疏于民众信佛的研究局面，力图给读者一个较为全面、完整的佛教发展脉络。文章按时间先后顺序从西晋开始，历经后秦、西秦、北凉、北朝、隋唐、吐蕃时期、归义军时期、回鹘时期、西夏和元明清等多个朝代，让你读完之后对河西佛教的历史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其内容涉及范围广，涵盖全面，既有皇帝、王公贵族的崇佛，又有高僧传法译经的事迹，还有普通民众的信佛，同时又对佛教石窟、文物等作了介绍和相关的研究。二是突出区域差异性的研究，注重河西佛教历史发展中的地方特征。作者从多层次多角度出发，分析了河西佛教的特色，并深刻分析了产生这些特色的社会背景。它早期的输运传播功能，中古时期辉煌的石窟艺术成就，自我发展的归义军佛教以及后来的藏传佛教影响等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文章内容在多个方面有学术上的创新和突破。文章虽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吸收，但许多内容都是杜斗成先生及其弟子多年研究成果的积累，不乏独到的学术见解。对两晋和北凉时期的译经以及高僧的活动，是先生着力用墨之处，也是早期研究佛教的成果。尤其对北凉时期经典的翻译作了细致而又认真的考证和梳理，填补了这一时期佛教研究的空白。另外对早期北凉石窟的辨析以及与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的关系，也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观点。可以说，北凉时期的佛教论述，是全书最为精彩的篇章之一。本书在论及隋唐时期佛教时专有一节写敦煌地区民众佛教信仰的生活，具体探讨了民众的写经活动、修窟以及流行的民间神灵信仰的情况，也不失为该书的亮点。对丰富的藏经洞文书资料的利用和研究，让我们看到了中唐至五代宋初这段时期河西佛教发展的详细历史。尤其是蕃占时期汉藏两地的佛教交流和归义军时期佛教的世俗化，都是以往人们所没有认识到的新内容。以上这些突破与创新将该书的学术价值呈现了出来。

四、资料使用和研究方法上，重视史料文献和石窟文物等实物资料的结合与相互考证。关于河西地区的佛教文献资料，不仅有传统的正史、大正藏等资料，还有敦煌藏经洞新出土的大量资料；另外，河西地区丰富的石窟资料和散落各地的佛教文物，它们历经历史上各个时期，也是研

究佛教的重要资料。通过这些资料的结合，相互印证某些历史事实。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二十余年来，无数次实地调查了河西地区大大小小的石窟以及佛教遗址，深入各地博物馆了解佛教文物，并对它们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书中的很多内容都是长期积累的成果。

五、注重了区域佛教与中华佛教整体的关系，强调整体与部分、地域与地域之间的联系和沟通。该书并未将眼光仅局限于河西地方佛教的研究，而是将它置于整个中华佛教发展背景之下来考查，重视了与外界的相互沟通和影响。这种思想在多个章节中都有体现。第一、二章考查了竺法护、鸠摩罗什、僧肇以及法显等高僧在河西的活动，但作者并未厚此薄彼，而是强调河西在东西方佛教交流方面的作用。在第三章中更是明确提出了河西佛教对北魏、高昌和南朝的影响。北朝时期敦煌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的建造深受“中原风格”影响的历史事实。第四章强调了隋唐时期的达摩笈多、玄奘以及众多外来游历河西的僧人将河西佛教与中原、西域佛教融通在一起的历史。而第六章吐蕃时期重点论及了两地佛教的融通与交流。第八章第三节考查了回鹘佛教对西夏、辽金的影响。西夏佛教则又论述了与周边民族的佛事交流以及对我国佛教发展的影响。而蒙元时期的佛教则重点论述了“凉州会谈”的作用以及忽必烈与八思巴对河西佛教的影响。几乎每个章节都有大量的内容关注与外界的沟通，而不是孤立地研究河西佛教，使读者能更加客观、真实地认识河西佛教的地位和发展脉络，对以后区域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资料。

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完美的。由于河西地区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丰富的佛教遗迹，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地方，近些年涌现出不少的优秀研究成果，若把这些成果补充进去，将更加真实完整地反映古代河西佛教的发展面貌。

总之，这部书能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编写区域佛教史，既突出了地方所独有的特色又注重了整体与各地佛教的关系，客观地再现了古代河西佛教发展的面貌。可以说它是一部当前区域佛教史研究中的鼎力之作。

（崔峰，历史学博士，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研究人员。）（责任编辑：無邑）